

(法) 皮埃尔-让·雷米 著

Pierre-Jean Rémy

许永健 郎维忠 译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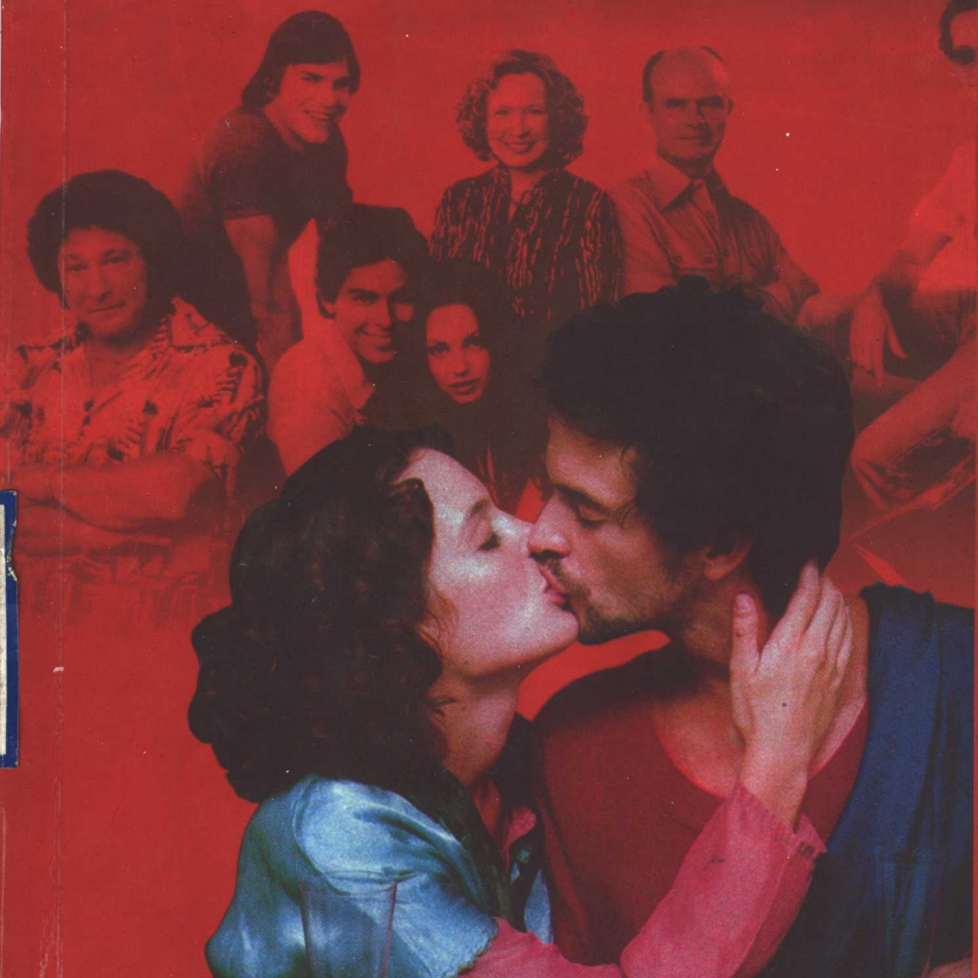


中国结
译丛

情陷

Le sac du Palais d'Été

紫禁城



Le sac du Palais d'Eté



“中国结”译丛

情陷紫禁城

Le sac du Palais d'Eté

(法) 皮埃尔-让·雷米 著

Pierre-Jean Rémy

许永健 郎维忠 译

海天出版社

Le sac du Palais d'Et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陷紫禁城/(法)让·皮埃尔·雷米著;许永健,郎维忠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3.9

ISBN 7-80697-019-3

I. 情... II. ①雷... ②许...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951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王晓珊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段昆伦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834609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75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图字:19-2001-193 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 物 表

西蒙·安格拉德：巴黎大学法律系讲师、经济学家，曾参加抵抗运动，1951年赴中国，先后在经济部门工作和外文出版社当编辑。

纪尧姆：法国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西蒙的密友，热衷于研究谢阁兰，曾与少女库芭赫恋爱，事情被揭露后被迫离开法国驻华大使馆。

克劳迪娅·奥特里克：瑞士人，年轻时因盗车而被捕，切斯曼救她出狱，并娶了她。她后来在伦敦遇见扬·奥特里克，跟其私奔。奥特里克任荷兰驻华大使，她随同前往北京，成了西蒙的情妇。

扬·奥特里克：维克多·奥特里克的儿子，曾任荷兰驻维也纳大使馆秘书，后任驻华大使，离婚后与克劳迪娅结婚。1958年去世。

爱弥尔·彭德格斯特：比利时汉学家，常驻北京，后与马里奥一起进行政治谋杀，被驱逐出境，在香港被费拉里法官收留，死于北角医院。

约翰·切斯曼：英国作家，扬·奥特里克的朋友，克劳迪娅的首任丈夫。

奥斯卡·奥特里克：扬·奥特里克的儿子，牧师，与妹妹埃莱娜关系暧昧，试图跟父亲亲近，但父亲不肯见他。妹妹出走以后，他便全心全意地履行圣职。后抛弃家庭，到中东和远东旅行，并在新加坡杀死巴龙，不久在香港失踪。

维克多·谢阁兰：法国海军军医、汉学家、考古学家和诗人，几次到中国探险，创作了诗歌《碑》、《冒险出征》、《西藏》等和一部小说《勒内·莱斯》。

马里奥·蒙迪尼：意大利杀手，曾加入法西斯组织，在西西里制造暴行。美军到达时被枪击，大难不死，逃亡到拉丁美洲。后为获得赏金而前往中国执行谋杀任务，被中国警方逮捕。

弗兰茨·贝尔林：生于德国的以色列画家，非常富有，拥有十分丰富的藏书。

汉斯·贝尔林：弗兰茨的侄子，诗人，先天失明，生活在慕尼黑以北的巴伐利亚山村。

勒内·布隆代尔：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任法国驻奥兰地区代表，1966年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保罗·巴龙-奥特里克：维克多·奥特里克的私生子，扬的同父异母兄弟，小时候跟扬打架，弄瞎一只眼睛。父亲去世后，他放火烧屋，并揭发侄子奥斯卡跟妹妹乱伦，后在新加坡一酒吧被奥斯卡杀死。

阿尔内·贝克尔：瑞典电影工作者，跟女演员哈里埃特结婚，在香港拍过一部影片，“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以旅游者身份访问中国。

贝尔蒙特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居住在中国。是维克多·奥特里克和谢阁兰的朋友，据说是中国末代皇后的情人，可能是维克多·谢阁兰的小说《勒内·莱斯》中的人物原型。

雅克·伯努瓦：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后被迫离职。

安德烈亚·基吉：意大利工程师，被法国有关部门派往中国，在西安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

迪迪埃斯：音响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曾驾车穿越中亚地区。爱上了一位蒙古公主，并把她带回了法国，后自杀身亡。

亨利·费拉里：意大利人，老劳伦佐的侄子，后入英国籍，任香港法院法官，工作马虎，贪赃枉法，后被革职。

弗雷德：克劳迪娅的弟弟，原籍瑞士，误入歧途，敲诈勒索，曾被人收买谋杀德弗里安部长，后在阿富汗被同伴杀死。

格鲁奇：牧师，后当船长，在新加坡的一次斗殴中失去一只胳膊，后来开始写诗。

马丁·赫弗：纽约的犹太人，卡尔·勒纳的学生，极左派分子，拒绝赴越南作战，回到美国后被监禁。

德弗里安：荷兰高级官员，扬·奥特里克的朋友，主持调查后者的死因，后在坎大哈被一个在阿富汗开厂的德国老板暗杀。

乔治·怀特：英国外交官，在朝鲜被俘，曾在中国东北边境长期住院治疗。获释后，回伦敦外交部工作。以间谍罪被捕，判处终生监禁，越狱逃亡。

大卫·艾伦：英国外交官，几次任职北京，西蒙的朋友，斯图奇的大学生，“文革”时离开中国。

夏尔-亨利·埃姆：中亚汽车旅行队队长，因病在车队到达上海时死亡。

弗朗索瓦-勒内·洪佩尔迪克：法国考古学家，巴黎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在中东进行过重大的考古发掘。

让-克洛德：纪尧姆的朋友，玛丽娅娜的丈夫，曾任阿尔及利亚奥兰省府新闻专员。

劳伦佐:意大利人,因敲诈富商而发财,在巴勒莫拥有豪宅。二战初期退隐在山村,跟年老的女仆生活在一起,后在地震中身亡。

卡尔·勒纳: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在大学教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入伍,在马恩河战役中失去一条腿,在西班牙内战中再次受伤。后在美国沃尔登大学任教授。与一个波兰姑娘同居,在中央情报局资助下创办《明天》杂志。

贝尔纳·刘易斯:法国人种学家和诗人,到处游历,多次去墨西哥和柬埔寨,在北京逗留期间爱上了克劳迪娅。收养过一个柬埔寨小姑娘,后因病在巴黎自杀。

勒内·莱斯:谢阁兰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比利时人,在北京长大,教人学汉语,爱说谎吹牛,说自己跟清朝宫廷里的人很熟,秘密警察头子,甚至是末代皇后的情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被神秘地毒死。

玛丽娅娜:让-克洛德的妻子,跟纪尧姆关系密切。丈夫死后回到法国,拒绝纪尧姆对她的追求,纪尧姆只好去中国。

让-贝尔纳·马兰·苏泽斯:法军驻阿尔及利亚少尉,后成为比利时某报驻越南记者,被越共俘虏后向越南解放军投降。

莫博托:在北京学习的喀麦隆留学生,西蒙的朋友,由于不能回国,便长期呆在北京。

维克多·奥特里克:荷兰外交官,扬·奥特里克的父亲,曾任驻华大使馆参赞、大使。跟贝尔蒙特医生和谢阁兰关系密切,后在贝鲁特结束职业生涯。写过很优美的诗歌,没有发表。

皮埃罗:马里奥的朋友,法西斯分子,杀人凶手,美军到达西西里时被枪决。

莫里斯·雷伊:北京使馆区法国女邮务员的儿子,能流利地说地道的汉语,喜欢冒充中国人。他尽管年轻,给谢阁兰当汉语老师。可能是小说《勒内·莱斯》主人公的原型之一。他跟随母亲到上海,完全忘记了小时候的事情。他体态肥胖,30岁意外死亡。

罗斯托夫:贝尔林的儿子,经济学家,朝鲜战争后开小差,到北京生活。

热拉尔·谢阁兰:维克多·谢阁兰的孙子,1966年到北京旅行,跟朋友纪尧姆重逢。

谢尔盖: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秘,大卫·艾伦的朋友。

克洛德·欣德尔:法国诗人,美国沃尔登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纪尧姆的朋友,后定居以色列。

帕特里克·韦尼奥:法律系学生,曾为秘密组织暗杀布隆代尔,却误杀

了让-克洛德,后离开该秘密组织。在开往东方的一艘轮船上,一个美国特务建议他去中国执行一项任务。

安德烈·韦尔维埃:法国驻北京公使衔参赞外交官,曾任驻朝鲜领事,爱上了中国姑娘陈英,却跟一个名叫伊莱娜的法国女人结婚。

威廉:德国留学生,奥斯卡的忘年之交,马列主义者,曾到中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指责其他为中国工作的西方人是修正主义者。回到欧洲后,积极参加“毛派”组织,后在西柏林的一次游行示威中,被警察杀死。

刘先生:曾在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和外文出版社担任要职,编纂《法汉词典》,没有完成。1945年曾被日本人关押,在狱中失去一只胳膊。

马医生:藤田的朋友,见过海明威,拥有毕加索的一幅画,他的女儿嫁给一个法国汉学家,后来被抛弃。

第一部 生者

第一章

慈善医院的四个嬷嬷一对一对从红砖墙前经过，夜幕降临了。这是春末的一个夜晚，伦敦的天空依然很蓝，雨后往往这样，树木的颜色还让人想起这场雨，想起腐殖土，几乎像是农村。

四个嬷嬷在马路角落拐了弯，天空更蓝了，凉爽而暖和；没有一丝云。于是我们都回家了。

西蒙·安格拉德在冷冷清清的马路上走着，双手插在衣袋里，衬衣贴着后背。他把粗棉布做的蓝色外套搭在肩上，在灰色的尘土中蹒跚而行。甚至连树木似乎都被炎热凝住了，昨天的龙卷风从戈壁吹来沙子，使它们的样子变得更怪，像是化石一般。西蒙的左脚踝还在疼。如果他能找到药店，他会停下来买酒精，清洗化了一星期脓的小伤口。这个可恨的小伤口现在还让他走路不便，拖着脚步。

马路上空空荡荡的，北京的八月，下午一点，是最热的时间。早上的游行已一窝蜂地回到被他们占了几个星期的老屋。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有时，一个黄色的屋顶，几乎可以说是金色的屋顶，映在灰砖上方的天空上——北京的这种灰色他现在已拥有好几年了——西蒙很快就分辨出鬼神出没的这些琉璃瓦；昔日的喇嘛庙如今变成了一所学校，里面有石膏做的鬼神和西藏的彩旗；他们在那里也要实行统治。金色的屋顶消失了，小棚屋很快就代替了王公旧宅，灰白相间的墙上，晶亮的石灰印已被一些小店铺取代，木窗格，破窗纸，有时玻璃也是破的。

西蒙渴了。一个杂乱的小店铺前，人行道旁边有许多木箱，里面放满了一瓶瓶已变成“国饮”的苏打水，他太了解这种黄乎乎的东西了，甜甜的，温温的。他没有停下脚步。

他也知道在这条马路上找不到药店——它尽管处于市中心（远远地

沿着紫禁城的城墙),看起来却像是郊区的一条道路——他感到脚疼。他停了下来,用胳膊夹着上衣。透过一扇半掩的门,他猜想着里面的院子、影子、别的院子、大字报,以及标语后面没有被完全窒息的嘈杂的生命。马路上和墙上的大字报与日俱增。

西蒙在一家小店门前停了下来,里面出来一个老头,提着一桶脏水,他看了一眼这个外国人,拖着脚步,一直走到阴沟边,好久才把桶里的水倒干净。然后,他弯着腰,几乎弯成了两截,慢慢地回到了家中。

一辆自行车。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似乎是径直从彩色海报中下来的。她来到西蒙身边,下了自行车,一动不动地盯着他。西蒙手里提着鞋(他终于把鞋子脱了下来,用指头摸了摸青紫色的小伤口),也看着她。她低下头,仍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西蒙注意到,她刚剪了头发,但她好像耸了耸肩,然后跨上自行车消失了。她的大腿是雪白的。

老人也消失了,也许他正在小店肮脏的窗子后面看着西蒙,但更可能是他躲到屋里乘凉去了,因为在这炎炎夏日,老人们都在遭罪。只剩下西蒙一人了,他踉踉跄跄,继续走路。

“这您是知道的,我亲爱的西蒙。”

老刘的声音很低,好像怕周围的绣花屏风和绿色植物后面藏着敌人似的。

“我们对您的工作很满意。”

这是恭维。老刘的法语无可挑剔,几乎可以说太纯正了,尽管语调有点不自然。

“您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良心都没有问题。”

这么多月以来,老刘第一次单独与西蒙谈话,以前都有秘书在场,那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青春痘,戴着眼镜,一刻不停地记录,好像每一句客套话都值得保存在那几本没有用的厚厚的案卷中似的。但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老刘站起身来,谈话结束了。

西蒙离开了外文出版社的接待室,他被辞退了。老刘几乎是在道歉:情况变化太快,必须反思以前的工作,重新考虑出版社对外国雇员的政策。接着,老刘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您知道,我想我编辞典的计划泡汤了。”

就像是一种默契:最后一刻,当西蒙刚跨出玻璃门,窗帘拉开了,老刘也许是想最后一次看看他。编辞典是一个梦,一个做了四十年的美梦,编一本收罗所有中国文言的法语辞典。老刘虽然不再编了,但仍记挂着这

件事，每次都想让西蒙感到他没有完全中断与过去的联系。

他做了一个手势：

“您不必马上离开。您还可以呆在北京，想呆多久就多久，甚至可以呆上一个月。当然，我会付您半年的工资和买机票的钱。”

西蒙握住他伸过来的双手。

“再见了，西蒙。”（他是用英语说的 Farewell^①。西蒙相信，老刘是想说：愿上帝保佑您。）

不止一次永别。这时，西蒙心想，我的生命就是由永别构成的。由机遇和永别构成。他喜欢让事情、动作和时刻变得浪漫起来。六月的一个早晨，在康塔勒省，当朱斯坦的儿子们开着蓝色的车子带着他冲向高原上坑坑洼洼的山路时，母亲也在跟他告别，那时他才二十岁。母亲没有哭，她手心里紧紧攥着一块手帕，好像她应该哭，但她忍住了。在农场的小路上拐弯时，黄色的土屋似乎摇晃起来。乡下从来没有这样绿过，被风吹得病恹恹的桉木从来没有这样茂盛过——应该是去年八月栽的，用来喂牲口，因为草料烂了——群山从来没有这样遥远、这样孤独过。

六月的那天，当他离开母亲时，他知道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然而，他当时只想着告别之美，永别之美。“我不装模作样。”他想。十年后，当他在马赛的海堤上拥抱一个女朋友时，他还在装模作样。他的船在港口抖动着，这个前往亚洲的旅人出发了。

这座新式的大楼非常可笑，墙皮已经剥落，坐落在矮房、浅色的砖瓦当中，周围是迷宫似的胡同、围墙和花园。西蒙一走出了这座他工作了六年之久的大楼，马上遭到了热浪的袭击。队伍已集合完毕。人们在附近的长安街络绎而行，静悄悄的，但锣鼓声马上就响起来了，一队队孩子举着主席的画像在前进。西蒙跛着脚，一直走到墙边的一条长长的阴影里。装饰过的大门、石狮，柳枝从院子里伸出来，垂在马路上。灰黑的石门槛已经磨损。

“我明天就走。”他起初这样决定。

这是最容易最理所当然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是断绝关系，那我们就断吧！尽管热得要命，北京最终还是动起来了。一些穿短裤的小孩喊叫着超过了他。他们手里拿着卷起来的大字报，稍后就会贴到墙上去。再

^① 意为“最后一次告别”，“永别”。

也没有必要留下来了，他在这里已经无事可干。人们把他给辞退了。但在旅行社里，人们告诉他，一周内去广东或莫斯科的飞机已经满员。正当他要离开旅行社的办公室时，一辆坐满苏联人的汽车在大楼的院子里停下，那些苏联人沉默寡言，坦率爽直，他跟他们很熟。一群充满敌意的人把他们围了起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举起拳头喊了些什么，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第一个从车里出来，在突然从四面八方拥来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这时，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额头。

散乱的形象：没完没了的回忆。

冬天的这个早晨，这个城市在一片白茫茫中醒来，多少年了？西蒙起得很早，想看雪，因为北京很少下雪。他一直走到故宫，但进不去。大门紧闭，售票窗也关着，一些穿着宽袖长外套的人从外面的一个台阶一直登上了午门的最高处，那是穿过子午线正中的一扇门。他们从那里走向红色的城墙。西蒙也想跟着走，但他被告知没有权利上去。他直到那时才明白，早晨登上城墙的那些沉默寡言、脸色阴沉的人是当局的大人物，他们才有资格欣赏宫廷中雪白的美景，普通老百姓现在不能进入故宫，以免弄脏干净的白雪。直到下午，西蒙才轮到进宫。宫殿矗立在已被阳光照得金黄耀眼的一大片白雪的尽头，使这座皇城显得更加宽阔和整齐，每个角都是四四方方的，每条线都是笔直的。

而现在天却热得像个火炉，长长的马路两边没有树木，朝东沿紫禁城褪色的城墙伸展，在炎热与灰尘中微微颤抖。这会儿，城市的嘈杂从四面八方西蒙袭来，队伍组织起来了。锣鼓声和叫喊声阵阵传来。他瞥见前面一条横街尽头的华侨饭店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广告牌，悬挂着旗帜，贴满写着大字的标语。西蒙朝东拐去（他一直跛着脚），走向这座仿现代的饭店。一年前的一天，他曾与一个流浪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吃过中饭，那个西班牙人娶了一个内蒙古女人，她一门外语都不会，但怀了孕，脸上总是笑咪咪的。于是，贝尔盖，这是那个西班牙人的名字，徒劳地到处弄欧洲签证，欧洲哪个国家的签证都行，想回家。

“老兄，您是一个两手空空、雄心勃勃的唯美主义者。”奥特里克笑着说，西蒙刚刚在他面前抱怨这个国家有些极端。

奥特里克点着一支小雪茄，抽着，不再说话。于是，西蒙自言自语，讲起了昔日的希望，讲起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爱，他天天所看见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西蒙刚刚停下来，奥特里克笑了，好像西蒙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孩

子。西蒙生气了，差点发作：

“您既然这么蔑视他们，为什么还呆这么久？您想什么时候离开就可以什么时候离开，你们的政府不会强迫您在同一个岗位呆六年的。”

“您不是也在这里呆了这么长时间吗，尽管您早就遮遮掩掩地抱怨过您所说的让人遗憾的极权？”奥特里克说，他一直笑着。

西蒙拒不开口，但他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荷兰外交官。陈给他端来了茶，给他送了一个很熟的桃子，奥特里克不再讽刺他。

这么说，他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十五年来，他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墙，紫禁城的城墙，君临着这双重的正方形建筑，绝对规整，仿佛受一种神圣的地形规则所支配，这种规则高傲地左右着设计它的建筑师的意识。一个双重的宫廷，由两个相连的空间组成，一个住着仆人，在下面；另一个在上面，以前住着帝王和神灵，如今那里只有一些坐办公室的人，他们埋头于纸堆里，但工作很有效率。灰墙，大门，那是另一种宇宙起源说，天上就像湖边的一个中式花园，花园里镶金的红色楼阁非常神秘，不对外人开放。离开北京是不可能的，有许多象征性的古门，也有一些看守严密的道路，它们并不通往什么地方。车站也被严密监视，机场也同样禁止入内，到处都需要旅行签证、通行证和许可证。证件上有那些能进入国家(故宫)内部的幸运的特权者的名字，有红色的印章、签名、印记，有红的，也有黑的。然后是北京的城墙。

十五年来，西蒙在做一个梦：通过中亚回欧洲，沿沙漠驼队的路线回家，绕过戈壁，鄂尔多斯地区，在路上拾取景教^①的小十字架，迎面遇到脸已经变形的佛教徒，他们一程一程地寻找自己原始的形状和阿波罗的模样。他弄了一些旧地图，标出了路线。在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地图，遮住了整面墙。他在上面读到帕米尔、吐鲁番、霍坚、哈拉诺尔或库库诺尔等地名时，又是激动，又是恐惧，好像这个回家计划并不属于这个现实世界似的。

来到华侨饭店门口时，西蒙犹豫了。这是北京最中性、人最少的地方。一些年轻人从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大楼好像已改成了一个总司令部。大家都穿着同样的白衬衣、蓝裤子，手里拿着红宝书，上面印着毛主席像。有个小伙子好像挺眼熟，戴着近视眼镜。西蒙认出来了，那是他以前的一

^① 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

个学生，他曾在北京大学教过经济计量学。那个小伙子看着他，犹豫了一会，向他走了一步，但又扭过头，退回去了。他周围的人也看着西蒙，但大家都朝长安街走了。十字路口又变得空空荡荡了。

西蒙一路瘸着（鞋磨着没穿袜子的脚跟），在王府井寻找开门的药店，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身手敏捷地用锤子砸烂写着商店店名的霓虹灯和彩灯。谁叫它们的名字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呢？从华侨饭店到王府井只有几百米远，但走过荒凉冷清的郊区之后，还要面对疯狂。一个德国记者正在用长镜头相机拍摄似乎在取乐的人群。

法国。一下雨，便起风。昂古莱姆^①的城墙像大海一样动荡。栗树已被吹得沙沙作响，弯着腰，周围的乡村在雨雾中摇晃。那时，西蒙很高兴，也很担心，但不知道担心什么。他才十二岁，也许十五岁。他迎着暴风雨，在路上走着。路面很滑，高低不平。当他回到路易-戴布朗德路的家中时，母亲总是说：“你疯了，我可怜的孩子。你会生病的！”或者，六月的一个晴朗傍晚，一些戴钟形帽的太太们推着高高的有篷童车，互相交流外省鸡尾酒的调法。人们谈论着永远也不会爆发的战争和卡圣捉巡游。“法国之乐”是每个月初巴黎的庆典，西蒙和父母则去鲁瓦扬度周末，在沙滩上打羽毛球，灰色的游泳裤用一条白色的皮带紧紧地扎着，然后，大家一起吃奶油蛋糕，有时是奶油塔，有时是双球夹心，有时是红口水仙^②，是在桑树大街的大甜品店里买的。

再看看中国。

巨大的人群涌向长安街，来到天安门前：今天，王府井的梧桐树下面有两万人。西蒙停下来看，这时，那个德国记者很快也过来了。

“唉，您熟悉众神的秘密，古代中国人对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会怎么想？”

海尔曼一边说，一边拍照，眼睛贴着相机的取景框。西蒙什么也没说，挥了一下手。海尔曼并不罢休。

“您的中国朋友们肯定知道。他们告诉您什么了吗，比如说那个老刘？”

西蒙耸耸肩，海尔曼也耸耸肩，然后消失在人群中。两个挺漂亮的女孩曾在这两个欧洲人面前停了一会儿，现在也走远了。不远处，接连传来

① 红口水仙，一种奶油蛋糕的名字。

② 昂古莱姆，法国夏朗德省省会。

玻璃破裂的声音，盖住了锣鼓声和铙钹声。商店的橱窗和霓虹灯广告被砸烂了，乒乒乓乓地落在地上。海尔曼一头金发，剪得短短的，他的脑袋在黑压压的头颅中出现了一会儿，然后又消失了。西蒙离开大街，拐进冷冷清清的胡同里。沉重的天空压向墙壁，使墙壁显得更加灰暗。他毫无目的地往北走去。

他这辈子杀过一个人。奇怪得很，这个当时充满幻想的人道主义者，现在回忆起来还激动万分。草从来没有长得那么高过，从来没有，不是吗？牧场从来没有像那年夏天那样绿过。朱斯坦的三个儿子把他扔在了斜坡上的一个树林边，扔在人们忘了收割的一片农田上方，因为战争爆发了。农田下方，有一条很窄的小河，一座用石头和木头搭的小桥和一排屏障似的山毛榉。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枪炮声，德国人甚至不再试着还击，他们挤在卡车上，尽可能走得远远的，去直接与正规军交锋。后来，有人跟西蒙、朱斯坦家的三兄弟和他们的朋友说，这样猛烈地射击溃逃的败军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回答说，在他们那个地方，正因为这种顽强的抵抗，才加快了敌人的溃败，制止了敌人的报复、还击、抓人质等战败者在恐惧的情况下所能做出来的一切。西蒙躲在杉树林中的阴影里等待着，手里拿着一把旧毛瑟步枪。几天前，他不得不扔掉那把爆裂了的冲锋枪，只找到了这把长枪。枪很重，不顺手，他还从来没有用过。几辆卡车从阿雄开过来，远远就能听见它们的声音，汽车的马达声有点不正常，劣质的发动机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突然，前两辆卡车同时来到了红色的采石场下面，离西蒙可能只有五百米远。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一声爆炸，卷起一股红色的粉尘，德国士兵纷纷倒在田野上。他们断断续续地用轻机枪胡乱地扫了一阵，然后往杉树林爬来。在道路的另一侧，一挺机关枪开始在采石场上方响起，敌人一片片倒在草地上。有几个德国兵纵身一跳，越过了小河，甚至没有走那座旧桥，往杉树林逃来。然而，他们一个个倒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径直朝藏在树后的西蒙奔来。他孤身一人，田野里没有顾上割的草高及膝盖，陡峭的斜坡减慢了他逃跑的速度，但他仍然胡乱地开枪。采石场的机关枪仍在扫射，但没有击中他，也许他已经被击中，但还在跑。西蒙蹲在那里，看着他向自己跑来。毛瑟枪响了，火药在岩石上爆炸，德国兵沿着斜坡滚了下去，钢盔也掉了，然后是一片寂静。

就在开枪的一刹那，西蒙感到很兴奋，为明天而深感高兴。他从被打死的德国兵身上缴获了武器，那个德国兵可能有四十来岁，脸色灰白，不是像西蒙或是朱斯坦家最小的兄弟那样长着一头金发的小伙子。不会有人会为杀了他而哭泣。几个月后，朱斯坦家的小兄弟死在孚日山区，他死

的那天,还给西蒙寄了一大包信,但西蒙永远没有收到,因为在1944年,邮局的运行很糟糕,而草却从来没有那么绿过。

刚到北京的那几天是最难受的。要对付的是整个城市,它好像一心一意要向他关闭。西蒙奔走着,寻找着,奉献着,但到处遭到拒绝。不过,大学里每个星期六都为学生们组织舞会,他经常去。舞厅里装饰着彩旗和花饰,乐队由一个手风琴手、一个钢琴演奏者、一个大提琴手组成,他们演奏的进行曲有点像青年旅店里面瑞士乐队演奏的曲目。有时是华尔兹。有几个穿棉布上衣的中国人,也许姑娘比小伙子多,外国人不稳定,他们到处游荡,比如说那个西班牙人贝尔盖,他仍然单身。两个胡子拉碴的瑞典人被迫刮掉胡子,他们闷了一个星期,星期六晚上失望地在乐队的喧闹声中跳舞,那些乐曲早就提不起他们的兴致来了。西蒙也在跳舞。一天晚上,他邀请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建筑师跳舞,她会讲英语。那时,人们可以比今天更自由地谈话:音乐、绘画。她知道毕加索,却不知道布拉格。关于毕加索,只有那幅“格尔尼卡”没有遭到她的批判。奇怪的是,她很熟悉米洛,但西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他三十岁,他紧紧地搂着她,也许有点太用力了,太紧了,但她没有反抗。天花板上白色的灯泡把一切都照得通亮,那个女子蓝色的眼圈看得清清楚楚,她突然微笑着对西蒙说,她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她女儿很漂亮,这个女建筑师一再说。西蒙原来还以为她才十七岁呢!他永远也弄不懂这个国家。他在城里大步走着,城墙还完好无损,他绕着皇城南部的护城河走着,在明亮的月光下欣赏狐塔。最坚决的中国人现在还假装害怕它。在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大笑中,鬼魂在塔里出没,西蒙有一天晚上曾和克劳迪娅去那儿冒险,他们相信看见了鬼魂。

在北京,外国人之间,尤其是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和真正的友谊也颇为难得,那时,他们已经离中国的节奏非常遥远,但仍然提防中国政府雇用的和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欧洲人。即使西蒙是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大学里的一个教授,那也于事无补。他首先遭到怀疑,让他感到最明显的是那几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网球好手,还有那些英国人,他们坚决地与外交官以外的人士保持距离,把自己关在那几个外交综合区里,躲进红砖老屋,屋墙上布满了长藤。几年后,人们将把这些砖头整块地抽出来,铺在城东的围墙边。

挪威使馆的一秘是个中国通,他是第一个请西蒙吃饭的人。那天,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芬兰大使假装没看见。西贝格尴尬地对他解释说,大使与中国高级官员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不想介入到外国人当中,给他们帮

忙。

那天晚上，西蒙独自在挪威一秘家中的绿色客厅里踱步，翻看着他的书和他买的中国的玩意儿，墙上挂着一幅幅丝绸巨画——风景或云彩，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然而，有个灰眼珠的外国女人，浅色的头发盘得高高的，对他微笑了一下，但她被一个矮矮壮壮、说话滔滔不绝的小个子的印度人或是巴基斯坦人缠住，只能对他微笑一下。吃饭时，分开几张小桌，他被安排在一个锡兰女人和一个英国男人旁边，那个英国人一副惊讶的样子，甚至有点滑稽。还有一个女人，他至今都不知道她是谁——因为一个荷兰记者把他拉到书架之间，要他讲述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初印象。他没别的办法，只能保持沉默，然后走开。

西蒙往北回去，开始离开左边紫禁城关闭的城门。一座巨大的石桥横跨护城河，以前，夏天的时候，许多老人抽着长长的包铜竹烟杆，坐在栏杆上休息，但今年不见了。东门的一扇红色的门扉上，贴着一张写着大字的布告，称：资产阶级市政府让人民在宫中、殿中和长廊里腐化变质，那里至今还散发出封建帝王的腐臭。一个背着武器的士兵在站岗，旁边有一道绿水，有人在划船。几对情侣悄悄地、害羞地手拉着手，在红墙下面轻轻地划着平底船。在他们头顶很远的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檐壁，金色的屋顶、龙、鬼怪和其他一些陌生的石头或灰泥怪物。

西蒙沿着紫禁城的城墙往前走，城墙的雉堞在阳光的照耀下很显眼，太阳已经西斜，夕阳洒在护城河静止的水面上。在他面前，有个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小孩在老太太后面小跑着，老太太转过身来等他。走到他们身边时，西蒙朝他们点了点头，老太太的脸马上放光了：“您好！您好！”小男孩穿着绣花的大长裤，屁股处已经裂开，他用童声不住地重复：“您好！您好！”西蒙注意到他戴着一顶黑色的无边软帽，上面用大头针别着一块块毛皮，还有一个圆形的小像章，红色的，闪着金光。毛主席像。

当人们建议西蒙到外省教书时，到普瓦提埃省，他起初还犹豫了几天。指导他论文的安德烈教授很清楚他担心什么：西蒙难以远离巴黎，他的全部生活都与第六区和第十五区的马路捆在一起。然而，很久以前，战前后几年，他们一起工作过的那家报纸已经转手，教授知道这种离开对西蒙损失很大，但西蒙对现状非常失望，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别人更没有信心，他只能仍然紧抓着他昔日的生活。

（这会儿，西蒙想起了老刘，他纯正的法语跟维克多·安德烈颇为讲究的法语一样准确、简练。安德烈已经死了，死之前没能再见到他昔日的学

生,但他几乎每个月都给西蒙写长信。对西蒙来说,那些信是他与年轻时的西方所保持的最后联系之一。)

后来,西蒙拒绝了别人给他提供的职位,带着和他生活了两年的女人离开了大学。

“您今天一言不发。”

西蒙深陷在藤椅里,看着圣絮尔皮斯教堂的钟楼,藤椅在他的重压下咔咔直响。那个女人叫米歇尔,一头金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后来好像很流行,她用吸管吸着橙汁。

“我做梦都想去外省生活。跟专区的荡妇调情,打桥牌,参加贵妇人的茶会,什么都不做……”

她感到有些失望:

“那你干什么?”

离他们所坐的露天咖啡馆最近的那座塔楼,四周围着用管子搭成的脚手架。栗树又红又绿。广场中间标识“四方位基点”的喷泉沉默了,下面的水池空了,西蒙凝视了一会儿教堂的塔楼,然后望着行人。一个长着大胡子的胖男人拄着一根拐杖走着,他知道那是个著名的画家。两个警察,黑色的斗篷亮闪闪的,掀起来搭在背上。米歇尔追问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好像想在巴黎当一辈子助手?”

(米歇尔一定是想说“我们的一辈子”。她想象自己结了婚,有了孩子,成了家庭主妇,有一个六居室的大套间,面对着圣絮尔皮斯广场,有一些闺中女友。当她长出头发,当她不再扮演小女孩的时候,便去卢森堡公园散步。)

西蒙站起来,把几个钱放在大理石桌面上,付了饮料款,走了。

米歇尔在后面追他,有些火了,但也有点担心,当她重新逮住他后,他花了三个月才完全甩掉她。后来,她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出版技术图书的出版商,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她真的在圣絮尔皮斯广场附近拥有了一个六居室的大套间。

克劳迪娅。夜幕降临在明陵,明陵离北京五十公里,是允许外国人散步的几个地方之一。

“你们别管我,我会带着克劳迪娅的!”

西蒙看着奥特里克经过他面前,朝着一条铺着大理石、通往最古老的坟墓之一的狭窄小路走去。他高一脚低一脚,洪佩尔迪克教授扶着他的胳膊,拉着他走。两人在用德语严肃地探讨中国诗歌中的死亡主题。西